

鲍照和江淹

曹道衡

“江鲍”并称大约始于隋末的王通，他在《文中子·事君篇》中说：“鲍照、江淹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。”王通是一位思想家，他对鲍照和江淹的评价纯系就思想倾向而言，并非对他们的创作风格进行评价。相反地，在梁钟嵘《诗品》中评论江淹时，却只是说他“诗体总杂，善于模拟”，并未提到他学鲍照，倒不如评沈约时，还提到一句“宪章鲍明远”。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，江淹的诗，实在远比沈约之作接近鲍照。这一点，似乎唐代人早已看出。如：杜甫在《赠毕四曜》一诗中说：“同调嗟谁惜，论文笑自知·流传江鲍体，相顾免无儿。”日本遍照金刚在《文镜秘府论·集论》中也提到“攀琅玕于江鲍之树”的话。这些评论显然已经涉及到风格问题，把“江鲍”看作为同一流派。不但如此，就是王通所说的“其文急以怨”，多少也和风格问题相关。那么江淹和鲍照的作品，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在这里，笔者想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。

(一)

在江淹作品中受鲍照影响最为明显的当数辞赋。他的赋作有不少是从鲍照作品中取得启发，甚至大量化用鲍照原句之意的。因此，王通所谓“急以怨”的共同特色，在两人的辞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。这是因为在江淹现存的二十多篇赋中，可以断定作于被黜为建安吴兴令的三年中者凡十五六篇之多，超过了半数。这个时期正是江淹一生中最不得志的阶段。因此和鲍照的经历颇为相近，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法鲍照作品，是很自然的。特别像《恨赋》、《去故乡赋》、《青苔赋》、《泣赋》、《待罪江南思北归赋》、《别赋》、《四时赋》等篇，实际上是一组作品，写的都是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之感，最能体现出“急以怨”的特点。正如钱钟书先生说的：“《去故乡赋》乃《别赋》之子枝也，《倡妇自悲赋》又《恨赋》之傍出也。《待罪江南思江北（当为“北归”）赋》：‘愿归灵于上国’，即《恨赋》‘迁客海上，流戍陇阴’之心愿；《哀千里赋》：‘徒望悲其何极，铭此恨于黄泉’，亦《恨赋》‘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饮恨而吞声’之情事。《青苔赋》：‘顿死艳气于一旦，埋玉块于穷泉；寂兮如何，苔积网罗，视青藜之杳杳，痛百代兮恨多！’则兼《别赋》之‘春官网此青苔色’与《恨赋》之‘闭骨泉里，已矣哉！’《泣赋》：‘若夫齐景牛山，荆卿燕市，孟尝闻琴，马卿废史，少卿悼躬，夷甫伤子’，‘少卿’又见《恨赋》：‘李君降北，吊影惭魂’，余人均可入《恨赋》。《泣赋》‘潺湲沫袖，呜咽染裳’无异《恨赋》：‘危涕’、‘血下沾襟’。《别赋》曰：‘盖有别必怨，有别必盈’实即恨之一端，其所谓‘一赴绝国，讎相见期’，讎非《恨赋》之‘迁客海上，流戍陇阴’耶？然则《别赋》乃《恨赋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，而他赋之于《恨赋》，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。”（《管锥编》第

1411页)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指出了江淹这一组辞赋的内在联系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赋中,《青苔赋》的一段话实出于鲍照的《芜城赋》。我们不妨引出加以比较,江淹《青苔赋》云:

若乃崩隍十仞,毁冢万年。当其志力雄俊,才图骄坚;锦衣被地,鞍马耀天。

淇上相送,江南采莲。妖童出郑,美女生燕。而顿死艳气于一旦,埋玉块于穷泉。

寂兮如何,苔积网罗。视青薰之杳杳,痛百代而恨多。

这段话不论从思想和情调来说,都与《芜城赋》十分相似。尤其是《芜城赋》中这段文字:

若夫藻扈黼帐,歌堂舞阁之基,璇渊碧树,弋林钓渚之馆,吴蔡齐秦之声,鱼

龙爵马之玩,皆薰歇烬灭,光沉响绝。东都妙姬,南国丽人,蕙心纨质,玉貌绛唇,

莫不埋魂幽石,委骨穷尘;岂忆同舆之愉乐,离宫之苦辛哉!

写的都是盛衰无常,繁华衰歇的悲哀。江淹的文字,显然是从《芜城赋》取得启发,而《青苔赋》这段话,又隐括着《恨赋》一篇的宗旨。特别是《恨赋》中写秦始皇和《别赋》中写贵人之别一段,手法无不与此相通。可见江淹辞赋中有不少作品,实多得力于鲍照之作。

江淹在建安吴兴时所作辞赋,还有一部分作品似亦取法鲍照。这部分作品大抵是借物自喻。如《翡翠赋》的结尾说:“嗟乎!鸡鹜以稻粱致忧,燕雀以堂构貽愁。既衔利之情近,又遭害之无由。今乃依赧火之绝垠,出赤县之絃州。道人迹而独立,揽天倪而为俦。竞同获于河雁,不俱怨于海鸥。必性命兮有当,孰能合兮可求。”这段话也令人联想起鲍照的《舞鹤赋》和《野鹅赋》。鲍照在《舞鹤赋》中认为鹤“朝戏于芝田,夕饮乎瑶池。厌江海而游泽,掩云罗而见羁。去帝乡之岑寂,归人寰之喧卑。岁峥嵘而愁莫,心惆惕而哀离”。《野鹅赋》更设想野鹅望征云而延悼,顾委翼而自伤,无青雀之衔命,乏赤雁之嘉祥,空矜君之园池,徒惭君之稻粱,愿引身而翦迹,抱末志而幽藏”。这些赋都是以禽鸟自比,借咏物以喻志。所不同的是,鲍照笔下的鹤和野鹅都向往着大自然,觉得在主人的园池里受到拘束;江淹则似乎觉得命运注定如此,虽然失去自由,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顾。所以在《石劫赋》中甚至说:“已矣哉,请去海人之仄陋,充公子之嘉客。傥委身于玉盘,从风雨而可惜。”这种不同的情绪是和两人当时的遭遇有关的。鲍照写《舞鹤赋》和《野鹅赋》时,正在宋临川王刘义庆幕下。当时刘义庆对他总的来说还算过得去,只是有时有些矛盾,同时他和同僚之间有些龃龉,因此感到当幕僚不自由而有一定的牢骚。至于江淹的情况则与此迥异,他已被建平王刘景素贬黜到当时的荒僻之地,但他还对建平王刘景素有一定的留恋。所以手法虽然近似,立意却有不同。

江淹辞赋不光在构思方面常取法鲍照,有时遣词造句,也常常刻意学鲍照。如《哀千里赋》:“北绕琅琊碣石,南驰九嶷桂林”,显然袭用《芜城赋》:“南驰苍梧涨海,北走紫塞雁门”。《恨赋》的“左对孺人,右顾稚子”,出于鲍照《拟行路难》中的“弄儿床前戏,看妇机中织。”《别赋》:“暂游万里,少别千年”,则出于鲍照的《代升天行》:“遨游越万里,少别数千龄。”这样的例子说明江淹不但熟读鲍照之作,而且创作时时刻从中汲取营养。当然,他的学鲍,并非处处都很成功,像上面举的几个例子,《哀千里赋》不免机械沿袭;《恨赋》和《别赋》更不过是因深爱鲍照名句而化用入赋中,其实《别赋》这段文字,在全文中不免显得多余而且不够和谐。

总的来说,鲍照和江淹的辞赋都受《楚辞》的影响较深。但鲍照似更多地得力于汉赋,

因此显得浑厚朴茂，苍劲有力，再加上他自己独有的奇险峭急的风格，在辞赋中自成一家。江淹的赋，则似更表现出魏晋以来辞赋的特点，着力于描写个人的某些细致的情绪，在手法上也兼学建安以后人的作品。如《江上神女赋》实际上有意仿效曹植《洛神赋》，但笔力较弱。赋中有些句子如“紫茎绕径始参差，红荷缘水才灼烁”，是两句七言对仗，已开梁陈以后如萧纲、萧绎、徐陵、庾信等人的小赋大量用五七言句的先声。这种情况说明清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之所以选录鲍照《芜城赋》而不收江淹诸赋的原因。

(二)

江淹的诗歌比起他的辞赋来，受鲍照的影响好像还不这样明显和直接。但是“急以怨”的共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。江淹诗以善于模拟著名，他的一些拟古诗，后来常被人误为被拟者的原作。不过，这种误解的情况却不很一样，例如江淹的《杂体诗三十首》中《陶征君·田居》一首被误认为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的第六首，大约始于宋代；《休上人·怨别》中“日暮碧云合，佳人殊未来”两句之被误认为汤惠休的原作，则起于明人。至于把他的《鲍参军·戎行》误为鲍照诗，则见于《南史·吉士瞻传》。这个误解最晚出于初唐李延寿，甚至可能在南朝后期，已有这种误解。我们今天根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来看，从南朝后期至唐初，鲍照、江淹集子的原本都还保存着，当时人对他们作品的风格理解得应该比我们要深。然而“江鲍”二人的作品，在当时已有人弄错，这不能不说明两人诗风的近似。

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鲍照和江淹的诗，就可以发现江淹的诗句，有不少是化用或模仿鲍照的。例如：江淹的《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》：

广成爱神鼎，淮南好丹经。此峰具鸾鹤，往来尽仙灵。瑶草正翕赭，玉树信葱青。绛气下紫薄，白云上杳冥。中坐瞰蜿蜒，俯伏视流星。不寻遐怪极，则知耳目惊。日落长沙渚，曾阴万里生。藉兰素多意，临风默含情。方学松柏隐，羞逐市井名。幸承光诵末，伏恩托后旌。

此诗由登高山想到求仙，又由求仙思想回过头来讲到建平王刘景素对自己的知遇。这种构思，基本上和鲍照的《登庐山望石门》和《从登香炉峰》二诗相同。诗中“瑶草正翕赭，玉树信葱青”两句，是说山上的怪异之物。这和鲍照《从登香炉峰》的“霜崖灭土膏，金涧测泉脉；旋渊抱星汉，乳窦通海碧”的用意类似。但鲍诗虽采取了道教中的仙话，而能“自铸伟词”；江诗则主要取古人现成之句，如“玉树”句即取扬雄《甘泉赋》：“翠玉树之青葱兮”文字。江诗“绛气下紫薄，白云上杳冥，中坐瞰蜿蜒，俯伏视流星”四句，其实构思同于鲍照《从登香炉峰》的“青冥摇烟树，穹跨负天石”二句。江诗先写珍奇之物，后写山高；鲍则先写山高，后写珍奇之物，只是先后次序之不同，用意还是相仿佛的。江诗中“中坐”二句，其实是化用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“宛虹拖于楯轩”和“奔星更于闺闼”二句，并非自创。至于“绛气”二句，则与鲍诗“青冥”二句各有所长。鲍诗显得生涩奇峭；江诗则对仗工整，显得清丽。江淹诗中“方学松柏隐，羞逐市井名”二句，实即化用鲍照《登庐山望石门》结句：“松桂盈膝前，如何秽城市”二句。江诗结句“幸承光诵末，伏恩托后旌”，即从鲍照《从登香炉峰》结句：“惭无献赋才，洗污奉毫帛”而来。可见江淹此诗，从构思、立意方面，都以鲍照登庐山时所作的几首诗为圭臬。

又如江淹的《渡西塞望江上诸山》一诗，其中有不少句子均取自鲍照的《登庐山》。如

“杂树共冬荣”句出于鲍诗“炎树信冬荣”句；“嘈嘖晨鷓鸣”句，出于鲍诗“嘈嘖晨鷓思”句；“结友爱远岳，采药好长生”二句，即鲍诗“乘此乐山性，重以远游情”二句；“海外果可学，岁暮诵仙经”二句，亦即鲍诗的“方跻羽人徒，永与烟雾并”二句。可见此诗的构思，亦与鲍照如出一辙。

江淹在赴建安吴兴途中所写的几首诗如《渡泉峒道出诸山之顶》、《迁阳亭》、《游黄蘗山》等首，最多古奥的诗句，其诗风本与鲍照相近。其中化用鲍照诗句的亦不少。如《渡泉峒道出诸山之顶》中“百年积流水，千里生青苔”；《游黄蘗山》中“残岵千代木，麴岑万古烟”等句，实化用鲍照《登庐山望石门》中“埋冰或万年，韬树必千祀”二句。《游黄蘗山》中“禽鸣丹壁上，猿啸青崖间”则显然是化用鲍照《登庐山望石门》中“鸡鸣清涧中，猿啸白云里”二句。又如江淹的《赤亭渚》中“水夕潮波黑，日暮精气红”二句，也取自鲍照《游思赋》中“暮气起兮远岸黑，阳精灭兮天际红”二句。从这些例子看来，江淹作诗曾留意于学鲍照是很清楚的。

当然，鲍诗和江诗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。两人虽然生活的年代相近，创作风格也有相似之处，但从他们各自的处境和经历以及所接受的文学传统来说并不相同。从生活经历上说，江淹的早年虽然和鲍照一样很不得志，但情况也不完全一样。鲍照以一介寒士，在刘义庆和后来的临海王刘子项幕下，本以文义自处，和当时的政治纠纷本无关系。只是在刘义庆死后，曾一度入宋文帝子始兴王刘濬幕下时，对刘濬的参与作乱密谋有所觉察，但时期很短，旋即离开。所以鲍诗中的不平之鸣，主要是针对门阀贵族的垄断仕途和人间贫富不均的怨恨。这些都是可以大声疾呼地加以揭露的。因此鲍诗中像《拟行路难》、《代贫贱苦愁行》，感情都很奔放，颇有点建安诗人“造怀指事，不求纤密之巧，驱辞逐貌，唯取昭晰之能”（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语）的气魄。他的诗歌尤以乐府见长，这是因为他作诗得力于汉魏乐府居多，诗风显得浑厚古朴，气质清刚。另外，在他的集中有《学刘公干体》五首，可见他对刘桢那种“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”（《诗品》语）的诗风颇为倾倒。所以他的诗也时多奇险之句。至于江淹早年从宋明帝泰始三年（467）左右入刘景素幕，至后废帝元徽二年（474）被黜为建安吴兴令，共在刘景素幕中八个年头，关系自然不同于鲍照。尤其是后废帝即位以后，景素和他手下一些人密谋着夺取帝位。对于这种密谋，江淹是清楚地察觉到了，他除了口头劝谏之外，又常常在诗赋中有所讽谏。但这种讽谏只能是含蓄不露的。因为密谋既不能公开说出，又须让景素心中明白。于是他就不得不效法阮籍《咏怀诗》那种“厥旨渊放，归趣难求”（《诗品》语）的手法。因此他的诗风较之鲍照，似少那种苍劲悲凉、古朴贞刚之气。但他的长处在于意蕴深远，含蓄不露。所以《诗品》评范云、丘迟时说他们“故当浅于江淹”，评沈约时也说他“意浅于江”。当然，江淹生活和创作的时代，正是诗风从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所谓“元嘉体”到“永明体”的过渡阶段。因此江淹诗风已趋于“永明诗人”之清丽，而不像鲍照那样还更近于谢灵运、颜延之的典雅、古朴。像今本《玉台新咏》所收的《征怨》和《咏美人春游》二首，不但密韵楼藏明覆宋本不载，而且明寒山赵氏覆宋本《玉台新咏》亦未收入。这两首诗是否江淹所作，似亦可疑。例如《征怨》：“荡子从征久，凤楼箫管闲。独枕凋云鬓，孤灯损玉颜。何日边尘净，庭前征马还？”这种诗风甚至已有点梁陈诗人的气息，但较之齐梁诗人，总觉尚有欠纯熟之处。后人所说的江淹“才尽”，可能是指他后来也创作过类此的诗歌，而终难与沈、谢媲美。可惜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著录的《江

淹后集》久已散佚，无法详究。

(三)

江淹的文较之他的诗赋似少受人重视。这大约因为他的文大多数是些应用文字，文学价值较高的不多。不过，在鲍照的文中，也多少有这些情况。关于江、鲍二人的文，历来评论其相似处的言论较少。但前人已有注意及之者，如清人许梈认为：“明远骈体，高髻八代。文通稍后出，差足颉颃，而奇峭幽洁不逮也。”（《六朝文絮》）事实上鲍照和江淹一些较有名的骈文大抵属于骈体的范畴，但他们都曾得力于两汉的散文和辞赋，所以比起同时一些人的文章来，显然见得古奥、雄健。例如前人颇为重视的鲍照《河清颂》，吴汝纶说此文之序“欲远追扬、马”；孙德谦说全文“气体恢宏，从汉文出”。此文实受司马相如《封禅文》影响。江淹的《尚书符》则取法于司马相如《喻巴蜀檄》；《诣建平王上书》更明显地出自汉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。在今天看来，像《河清颂》和《尚书符》这样的文章，恐怕爱读者不多。但鲍照和江淹的文，仍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佳作。如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至今仍是骈文中的传诵名作；《石帆铭》和《瓜步山揭文》亦富有特色。江淹的文，现在似更少被提到，但他的《诣建平王上书》和《袁友人传》二文，还是颇有文学价值的。

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虽是一封家书，但其中写景的成分，实受汉赋的影响极深。文中写旅途所见，宛然司马相如《子虚上林赋》、扬雄《甘泉赋》的笔调。文中写庐山一段文字，形象十分生动，且善用夸张手法，最为历来读者所称道。这段文字虽过于艰深，但读来自觉其雄肆朴茂，惊人心魂，不但与司马相如、扬雄之作相近，简直可以上追枚乘《七发》。

《石帆铭》的文体虽然多少与晋张载《剑阁铭》相近，但作者参以汉赋奇崛的手法，显出独特风格。因此清许梈评此文“奇突古兀，锤炼异常”。《瓜步山揭文》更是一篇绝妙的杂文，借瓜步山的形势以讽刺世间的人“才之多少，不如势之多少远矣”。此文多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，遣词造句亦取法汉赋，而命意则兼取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中刺世的成分，显得尤为奇险峭刻。

江淹的《诣建平王上书》曾被《文选》所收录，可见在六朝时颇受人重视。这篇文章从全篇结构到使用典故和排句甚多等特点看来，显然主要以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为主要模拟对象，但此书的文风已更显出骈丽化倾向。如文章一开头就说：“昔者，贱臣叩心，飞霜击于燕地；庶女告天，振风响于齐台”，这是典型的骈文句法。文中还有“此少卿（李陵）所以仰天捶心，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”之句，显然用的是相传为李陵所作《答苏武书》的典故。此文确实也受了《答苏武书》的影响，所以显得比鲍照之文更绮丽，却缺乏其高古雄肆之气。江淹还有一篇《袁友人传》，虽很少有人提到，却是南北朝文中罕见之作。此文虽短，感慨颇深，而且全文几乎无一骈句。文的结尾说：“嗟乎！斯才也，斯命也，天之报施善人，何如哉！何如哉！”这种笔调又令人想起司马迁的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袁炳是江淹的好友，也许正由于他对朋友的坎坷遭遇胸怀不平，所以直抒胸臆，不假骈四俪六之词，而使人反感亲切。这种文章不但江淹本人就是整个南北朝，亦甚少其例。

总的来说，在鲍照和江淹的文中，除了给人代笔的文字（这类文章江淹现存的更多）外，在一些应用文字中，也多少可以看出一些“急以怨”的特点，如鲍照的《谢解禁止表》、《谢随恩被原疏》；江淹的《诣建平王上书》、

（下转121页）

力的思想和真诚的感情是创造一首真正的诗所必需的，一部作品的思想力量只来自个人感情的真挚和新颖独到的情趣，因而泰纳常常把情感和情感的真诚作为杰出的艺术的标准^④。韦勒克的引证和分析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泰纳对文艺情感特性的认识。

“主要特征”说和“感情显现”说承继不同，角度有异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泰纳对文艺本质的理解。艺术的本质和使命，决定艺术的功用。基于对文艺本质和使命的认识，泰纳进一步揭示了艺术与科学的联系和区别，指出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。泰纳认为，艺术和科学活动是人超出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，是人类高级的静观默想的生活的重要内容。这种高级的生活以掌握人所依赖的永久与基本的、掌握控制一切的主要特征为目的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有艺术和科学“两条路”。科学找出基本原因和基本规律，用正确的公式和抽象的字句表达出来；艺术同样要掌握基本原因和基本规律，但它“不用大众无法了解而只有专家懂得的枯燥的定义，而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，不但诉之于理智，而且诉之于最普通的人的感官与感情。艺术就有这一个特点：艺术是“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”，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大众^⑤。这里，泰纳把艺术和科学相提并论，实际上包含了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的思想，指明了它们基本内容的一致性和表现形式的差异性，揭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主要特点。更为可贵的是，泰纳特别强调了艺术与大众和最普通的人的联系，要求艺术获得他们的理解和赞赏，这不仅在当时有积极的作用，而且在今天对于纠正脱离现实、无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的不良创作倾向，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注：①③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傅雷译《艺术哲学》第22—23页，356—357页，337页，338页，27页，23页，22页，27页，38页，36页，26页，24页，345页，23页，343页，339页，14—15页，17—18页，26页，27页，30页，411页，31页，64—65页。

②《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》第546—547页。

③《德国古典美学》第160页。

④黑格尔《美学》第一卷第214页。

⑤《别林斯基论文学》第124页。

⑥逸夫译《〈英国文学史〉序言》，见《世界文库》第10卷第4803页。

⑦《西方文论选》下卷第241页。

⑧见韦勒克《近代文学批评史》（英文版）第3卷泰纳部分。

（上接93页）

《被黜为吴兴令辞笈诣建平王》等文都是如

此。以艺术风格而论，鲍照和江淹的文风，也有一个类似之处，即好奇。鲍照诗文之奇，在于他的构思新奇，如著名的诗句“马毛缩如猬，角弓不可张”（《代出自蓟北门行》），而在文中，如《石帆铭》之起句“应风剖流，息石横波，下濑地轴，上猎星罗”四句就来得突兀，出人意表。《瓜步山揭文》的结尾则设想出“涕洟江河，疣赘丘岳”；“奋风漂石，惊电剖山，地纶维陷，川斗毁宫”种种怪奇陆离之象，令人想起《庄子》中的一些巧妙的寓言。江淹之文，也有“奇”的一面，但他似乎更着重于用字新奇，如《恨赋》的“孤臣危涕，孽子坠心”；《别赋》的“心折骨惊”和《建平王庆帝疾和表》之“望景暂亏”，以“望”（望舒）代月，以“景”代日；《萧领军让司空并敦劝启》之“既挠汨苍祗”，以“苍”代天，以祗（地神）代地。读来似觉新颖，但毕竟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。相比之下，前人认为江不如鲍的看法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